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4.5.29】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学（纲要） ——以八位学者为例

葛兆光

从晚清到民国，即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替代经学，成为主流学问，改变了清代学术格局，并且使中国历史叙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时间缩短，二，空间变大，三，史料增多，四，问题复杂。

1，梁启超：现代中国历史叙事的兴起

（1901）梁启超：《中国史叙论》第一节《史之界说》、第二节《中国史之范围》、第三节《中国史之命名》（中华书局影印本：《饮冰室合集》第一册“饮冰室文集之六”，1989）1-3 页。

【参考文献】：

梁启超《新史学》第一部分《中国之旧史》（中华书局影印本：《饮冰室合集》第一册“饮冰室文集之九”）；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2，夏曾佑：重编新型历史教科书

（1904）夏曾佑（1861-1924）《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33 年，商务印书馆重版，改称《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重印本，2000）第一编《序例》。

【参考文献】

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载《饮冰室合集》第三册（饮冰室文集之四十四，上），北京：中华书局，1989；19-23 页

钱穆《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原载《图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1934；原署名“公沙”；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第 23 册《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九）》，279-292 页。

4，王国维：新史料与新历史

（1925）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见之新学问》，原载《学衡》第二卷 45 期。收入《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参考文献】

王国维《库书楼记》，载《观堂集林》卷二十三，《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商务印书馆 1940 年本，1983）三十四页。（1922）

抗父《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东方杂志》第 19 卷 3 号，1922 年 2 月。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247-248 页。

3, 胡适：来自西方的叙事典范

(1919) 蔡元培《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序》，《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第六册；155-156页。

【参考文献】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第一篇《导言》(《胡适文集》第六册，163-184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序言(中华书局重印本)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1)，279-283页。

5, 顾颉刚：追求客观性的现代历史书写

(1923)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载《古史辩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14-17页。

【参考文献】

顾颉刚《古史辩自序》，《古史辩》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重印本；

英文本，*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 恒慕义(Arther W.Hemmel)译，Brill, 1931:

又，参看恒慕义(Arthur W.Hemmel)的介绍：*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their Own History?* 载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4-4(1929), 715-724

6, 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

(1928)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节选)，《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3-8页。

【参考文献】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第四讲《史料略论》开头部分论述“史学就是史料学”，《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308-309页。

傅斯年《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原为未刊稿)特别是154-156页，《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308-309页。

傅斯年《东北史纲》卷首《引语》，《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374-375页。

7, 陈寅恪：与国际学界的融合与竞争

(1930)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266-268页。

【参考文献】

陈寅恪《与妹书》，见《陈寅恪集·书信集》(陈寅恪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1-2页；同时又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355-356页。

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陈寅恪集，北京：三联书店，

2001) 163 页。

贺昌群《日本学术界之“支那学”研究》，原载 1933 年 10 月 26 日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三期，收入《贺昌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一卷。

8. 钱穆：民族危机下的国史书写

（1940）钱穆《国史大纲》（上）卷首“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及《引论》第一、第二小节（《钱宾四先生全集》第 27 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19-25 页。

【参考文献】

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载《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参考书 1】

（1947）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2006）1-4 页

【参考书 2】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翻译出版的影响较大的几种西方史学理论著作：
1924 年，鲁滨生（J.H.Robinson）著，何炳松译《新史学》（北京大学丛书第 10 种），商务印书馆，上海。

1926 年，朗格诺瓦（C.V.Langlois）、瑟诺博司（C.Seignobos）著，李思纯译《史学原论》，商务印书馆，上海。

1928 年，Robert Flint 著，郭斌佳译《历史哲学概论》（Introd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History），新月书店，上海。

1929 年，绍特韦尔（J.T.Shotwell）著，何炳松、郭斌佳译《西洋史学史》（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商务印书馆，上海。

梁啟超（1873—1929）①

飲冰室文集之六

中國史敍論

第一節 史之界說

史也者，記述人間過去之事實者也。雖然，自世界學術日進，故近世史家之本分與前者史家有異。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其事實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難名爲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係。以此論之，雖謂中國前者未曾有史，殆非爲過。

法國名士波留氏，嘗著俄國通志，其言曰：俄羅斯無歷史，非無歷史也。蓋其歷史非國民自作之歷史，乃受之自他者也。非自動者而他動者也。其主動力所發，或自外，或自上，或自異國，或自本國。要之，皆由外部之支配，而非由內部之產生，宛如鏡光雲影，空過於人民之頭上，故只有王公年代記，不有國民發達史。是俄國與西歐諸國所以異也。云云。今吾中國之前史，正坐此患。吾當講此史時，不勝慚憤者，在於是。吾當著此史時，無限困難者，在於是。

德國哲學家埃施特哈斯氏曰：人間之發達，凡有五種相。一曰智力。理學及智識之進步皆歸此門二曰產業。三曰美術。凡高等技術之進步四曰宗教。五曰政治。凡作史讀史者，於此五端，忽一不可焉。今中國前史，以一書而備具此五德者，固渺不

可見，即專詳一端者，亦幾無之所陳陳相因者。惟第五項之政治耳。然所謂政治史，又實爲紀一姓之勢力圖，不足以爲政治之真相。故今者欲著中國史，非惟無成書之可沿襲，即搜求材料於古籍之中，亦復片鱗殘甲，大不易易。

第二節 中國史之範圍

(甲)中國史與世界史。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國爲中心點，雖日本俄羅斯之史家，凡著世界史者皆不亦無異議焉。蓋以過去現在之間，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實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與爭也。雖然，西人論世界文明最初發生之地有五：一曰小亞細亞之文明，二曰埃及之文明，三曰中國之文明，四曰印度之文明，五曰中亞美利加之文明。而每兩文明地之相遇，則其文明力愈發現。今者左右世界之泰西文明，即融洽小亞細亞與埃及之文明而成者也。而自今以往，實爲泰西文明與泰東文明即中國相會合之時代，而今日乃其初交點也。故中國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國史在世界史中當占一强有力之位置也。雖然，此乃將來所必至，而非過去所已經。故今日中國史之範圍不得不在世界史以外。

(乙)中國史與泰東史。泰東史者，日本人所稱東洋史也。泰東之主動力全在中國，故泰東史中中國民族之地位，一如世界史中阿利揚民族之地位。日本近來著東洋史者，日增月盛，實則中國史之異名耳。今吾所述，不以泰東史名之者，避廣闊之題目，所以免汗漫罣漏，而供簡要切實之研究也。至於二千年來亞洲各民族與中國交涉之事最繁贍，自歸於中國史之範圍，固不待言。

第二節 中國史之命名

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尋常通稱或曰諸夏或曰漢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稱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漢唐等名吾史則戾尊重國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則失名從主人之公理。曰中國曰中華又未免自尊自大貽謔旁觀雖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汚我國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誣我國民猶之不可也。於三者俱失之中萬無得已仍用吾人口頭所習慣者稱之曰中國史雖稍驕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國今世界之通義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實亦未始非喚起精神之一法門也。

第四節 地勢

中國史所轄之地域可分爲五大部。一中國本部。二新疆。三青海西藏。四蒙古。五滿洲。東半球之脊實爲帕米爾高原亦稱葱嶺蓋諸大山脈之本幹也。葱嶺向東衍爲三派其中部一派爲岷崐山脈實界新疆與西藏焉。岷崐山脈復分爲二其一向東其一向東南向東南者名巴顏喀喇山界青海與西藏入中國內地沿四川省之西鄙蔓延於雲南兩廣之北境所謂南嶺者也。其向東者名祁連山。互青海之北境其脈復分爲二一向正東經渭水之上流蔓延於陝西河南所謂北嶺者也。一向東北沿黃河互長城內外者爲賀蘭山更北爲陰山更北爲興安嶺縱斷蒙古之東部而入於西伯利亞蓋中國全部山嶺之脈絡爲一國之主幹者實崐崙山也。使我中國在亞洲之中劃然自成一大國者其大界線有二而皆發自帕米爾高原其在南者爲喜馬拉耶山東

行而界西藏與印度之間。其在北者爲阿爾泰山，實爲中俄兩國天然之界限焉。在崑崙山與阿爾泰山之中與崑崙爲平行線者爲天山，橫斬新疆全土，分爲天山南北路，而終於蒙古之西端。

中國之大川，其發源之總地有二。其一在中國本部者，曰黃河，曰揚子江，曰西江，曰金沙江，皆發源於新疆西藏之間。其二在中國東北部者，曰黑龍江之上流斡難河、克爾倫河，其支流之嫩江，曰色楞格河，曰鄂爾坤河等，皆發源於蒙古之北部。大抵諸大川河中與歷史最有關係者爲揚子江，其次爲黃河，其次爲西江，黑龍江。

蒙古及新疆雖爲諸大河之發源地，但其內部沙漠相連，戈壁瀚海準噶爾之諸沙漠，殆占全土之大半，故河水多吸收於沙漠中，或注瀉於鹽湖。

地理與歷史最有緊切之關係，是讀史者所最當留意也。高原適於牧業，平原適於農業，海濱河渠適於商業，寒帶之民擅長戰爭，溫帶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歷史之公例也。我中國之版圖，包有溫寒熱之三帶，有絕高之山，有絕長之河，有絕廣之平原，有絕多之海岸，有絕大之沙漠，宜於耕，宜於牧，宜於虞，宜於漁，宜於工，宜於商。凡地理上之要件與特質，我中國無不有之，故按察中國地理，而觀其歷史上之變化，實最有興味之事也。中國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則以黃河、揚子江之二大川橫於溫帶，灌於平原故也。中國文明何以不能與小亞細亞之文明、印度之文明相合集而成一繁質之文明？則以西北之阿爾泰山西南之喜馬拉耶山爲之大障也。何以數千年常有南北分峙之姿勢？則長江爲之天塹，而黃河沿岸與揚子江沿岸之民族，各各發生也。自明以前，何以起於北方者其勢常日伸，起於南方者其勢常日蹙？以塞帶之人常悍烈，溫帶之人常文弱也。東北諸胡種，何以二千餘年迭薦中夏，以其長於獵牧之地，常與天氣及野獸戰，僅得生存，故其性好戰狠鬪，又慣遊牧。

逐水草而居。故不喜土著而好侵略。而中國民族之性質適與相反也。彼族一入中國。何以即失其本性。同化於漢人。亦地質使之然也。各省地方自治制度。何以發達甚早。則以幅員太大。中央政府之力常不能及。故各各結爲團體。以自整理也。何以數千年蟠伏於君主專制政治之下。而民間曾不能自布國憲。亦以地太。團體太散。交通不便。聯結甚難。故一二梟雄之民賊。常得而操縱之也。何以不能伸權力於國外。則以平原膏腴足以自給。非如古代之希臘腓尼西亞。及近代之英吉利。必恃國外之交通。以爲生活。故冒險遠行之性質不起也。近年情形。何以與昔者常相反。則往時主動力者。常在盤據平原之民族。近時主動力者。常在沿居海岸之民族。世界之大勢。驅迫使然也。凡此諸端。無不一一與地理有極要之關係。故地理與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後文明以起。歷史以成。若二者相離。則無文明。無歷史。其相關之要。恰如肉體與靈魂相待以成人也。

第五節 人種

種界者。今日萬國所斷然以爭之者也。西人分世界人種。或爲五種。或爲三種。或爲七種。而通稱我黃色種人。謂爲蒙古種。此西人闇於東方情實。謬誤之談也。今考中國史範圍中之各人種。不下數十。而最著明有關係者。蓋六種焉。

其一苗種。是中國之土族也。猶今日阿美利加之紅人。澳大利亞之黑人也。其人在歷史以前。曾占重要地位。自漢族日漸發達。苗種即日就窘迫。由北而南。今猶保殘喘於湖南貴州雲南廣西之間。其在安南緬甸等地。亦間有焉。

其二漢種 即我輩現時偏布於國中。所謂文明之胄。黃帝之子孫是也。黃帝起於崑崙之墟。即自帕米爾高原東行而入於中國。棲於黃河沿岸。次第蕃殖於四方。數千年來。赫赫有聲於世界。所謂亞細亞之文明者。皆我種人自播之而自穰之者也。

其三圖伯特種 現居西藏及緬甸之地。即殷周時代之氐羌。秦漢之月氏。唐時之吐蕃。宋時之西夏。皆屬此族。

其四蒙古種 初起於貝加爾湖之東隅一帶。次第南下。今日蔓延於內外蒙古及天山北路一帶之地。元朝即自此族起。混一中國。威震全地。印度之謨嘉爾帝國。亦此族所建設也。

其五匈奴種 初蕃殖於內外蒙古之地。次第西移。今自天山南路以至中亞細亞一帶之地。多此族所占據。周以前之玀狁。漢代之匈奴。南北朝之柔然。隋之突厥。唐之回紇。皆屬此族。現今歐洲土耳其國。亦此族所建立也。其六通古斯族 自朝鮮之北部。經滿洲而蔓延於黑龍江附近之地者。此種族也。秦漢時代之東胡。漢以後之鮮卑。隋及初唐之靺鞨。晚唐五代之契丹。宋之女真。皆屬此族。今清朝亦自此興者也。

西教徒所主張。以謂全世界之人類。皆由最初之一男一女而生。但今日世界大通。人種學大明。此論之無稽。殆不足辯。然則各種各族。各自發生。其數之多。殆不可思議。且也錯居既久。婚姻互通。血統相雜。今欲確指某族某種之分界線。其事蓋不易易。況遊牧民族。遷徙無常。立於數千年之後。而前者發現於歷史上之民族。一一求今之民族以實之。非愚則誣。故今日以六種族包括中國史內之人民。誠不免武斷墨漏之譏。但民族爲歷史之主腦。勢不可以其難於分析而置之不論。故舉其在史上最有關係者。約而論之云爾。

今且勿論他族，卽吾漢族，果同出於一祖乎？抑各自發生乎？亦一未能斷定之間題也。據尋常百家姓譜，無一不祖黃帝。雖然，江南民族自周初以至戰國，常見有特別之發達，其性質習俗頗與河北民族異其程度。自是黃河沿岸與揚子江沿岸，其文明各自發達，不相承襲，而甌閩兩粵之間，當秦漢時，亦既已繁盛，有獨立之姿。若其皆自河北移來，則其移住之歲月，及其蹟跡，既不可考見矣。雖然，種界者本難定者也。於難定之中而強定之，則對於白機紅黑諸種，吾輩割然黃種也。對於苗圃伯特蒙古匈奴滿洲諸種，吾輩屬然漢種也。號稱四萬萬同胞，誰曰不宜。

第六節 紀年

紀年者，歷史之符號，而於記錄考證所最不可缺之具也。以地理定空間之位置，以紀年定時間之位置，二者皆為歷史上最重要之事物。凡符號之優劣，有一公例，即其符號能劃一，以省人之腦力者為優；反是則為劣。是也。故凡野蠻時代之符號，必繁而雜；凡文明時代之符號，必簡而整。百端皆然，而紀年其一端也。古代之巴比倫人，以拿波吶莎王為紀元。在今西曆紀元前七百四十七年希臘人初時以執政官或大祭司在位之時，按年紀之。其後改以和靈比亞之大祭為紀元。當紀元前七百六十七年羅馬人以羅馬府初建之年為紀元。當紀元前七百五十三年回教國民以教祖摩哈默德避難之年為紀元。當紀元前二十二年猶太人以創世紀所言世界開闢為紀元。當紀元前七百六十一年自耶穌立教以後，教會以耶穌流血之年為紀元。至第六世紀，羅馬一教士乃改用耶穌降生為紀元。至今世界各國用之者過半。此春秋西紀年之符號，逐漸改良，由繁雜而至簡便之大略也。吾中國向以帝王稱號為紀，一帝王死，輒易其符號，此為

②夏曾佑 (1861-1924)

第一篇 凡 例

讲堂演述，中学较西学为难，西学有途辙，中学无途辙也。是编有鉴于此，故于所引之书，皆于其下作一记号。如第三节一，检附卷中第三节（一），即可知其出处；其不作记者，皆二十四史之文，因是编以二十四史为底本，故不复注其出处也。若正史与他书文错于一处者，仍注出处，其一节中征引过繁者，均注出处于本文之下，不复缀号，以省错误。

是编分我国从古至今之事为三大时代，又细分之为七小时代。每时代中于其特别之事加详，而于普通之事从略。如言古代则详于神话，周则详于学派，秦则详于政术是也。余类推。

书中所引人名、地名，各从其所本之书，而见于标题及卷首中者，则以至通行之书为本。如包牺之名，即用《易》文也。余类推。

列更年表，与古人著述，有与史事关系极切，而其物又不可谓而考者，特在附录入，以供博考。

中国之绘画图画，今中国古图画不传，后人所补作者，甲乙之难，迄无定论，是编一概不录。

中国历史体段太大，仓猝编述，漏误必多，当俟将来加

第二篇 凡 例

第一篇中所见人名，大都年代久远，强半不知其字与何地人。本篇时代渐近，诸人之字号籍贯，大都可考，今皆随文注明，惟两汉不及深注，另作附录附于后。

第一篇中，中国尚为无数小国，其事并无统纪，不能不以表明之。本篇两汉皆一统，三国虽分，尚不破碎，故无所用表。

本篇用意与第一篇相同，总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文字立名，其纲只三端。一、关乎皇室者，如宫廷之变，群雄之成，凡为一代兴亡之所系者，无不详之。其一人一家之事，则无不从略，虽有名人，如与所举之事无关，皆不见于书。一、关乎外国者，如匈奴、西域、西羌之类，事无大小，凡有交涉，皆举其略，所以代表。一、关乎社会者，如宗教、风俗之类，每于有大变化时详述之，不随朝而举也。执此求之，则不觉其繁重矣。（第一章）

本章原拟自晋迄五代，今所述自晋迄隋而止。惟自晋迄五代之事，本多一贯，今既中断，其间种种情事，遂有不能结论之处，读者谅之。

本章所述时期，乃中国由单纯之种族、宗教，汉以前之种族、宗教，亦不得谓之单纯，惟较汉以后为单纯耳。转入复杂之种族、宗教时，故讲述当以此为急。本篇所详，即此二事。然种族之概，虽已略具，而宗教则已限于时日，未遑详述。

本章时事复杂，非表不明。惟作表则必不能简，将居全书之半，而事仍不能详，今竟不复作表。清嘉定徐文范，有《东晋南北朝舆地表》，既志舆地，复详人事，即可作为本篇之表。

第二篇皆属中古史范围，故章数相承。（第二章）

⑤ 胡适 (1891-1962)

中国古代哲学史/序 155

序

我们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第一是材料问题：周秦的书，真的同伪的混在一处。就是真的，其中错简错字又是很多。若没有做过清朝人叫做“汉学”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错误。第二是形式问题：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纪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

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稟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先生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才满一年。此一年的短时期中，成了这一编《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可算是心灵手敏了。我曾细细读了一遍，看出其中几处的特长：

第一是证明的方法。我们对于一个哲学家，若是不能考实他生存的时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来源；若不能辨别他遗著的真伪，便不能揭出他实在的主义；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辩证的方法，便

不能发现他有无矛盾的议论。适之先生这大纲中此三部分的研究，差不多占了全书三分之一，不但可以表示个人的苦心，并且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孔子之前，是无可疑的。但要从此等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记载中，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编成系统，不是穷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适之先生认定所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不是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所以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这是何等手段！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汉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诸子；近人替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这都是闹意气罢了！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统的研究。古人记学术的都用平行法，我已说过了。适之先生此编，不但孔墨两家有师承可考的，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便是从老子到韩非，古人划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家的，一经排比时代，比较论旨，都有递次演进的脉络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见不到的。

以上四种特长，是较大的，其他较小的长处，读的人自能领会，我不必贅说了。我只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

中华民国七年八月三日 蔡元培

④ 王国维 (1877-1927)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案。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今将此二三十年发见之材料，并学者研究之结果，分五项说之。

(一) 殷虚甲骨文字

此殷代卜时命龟之辞，刊于龟甲及牛骨上。光绪戊戌、己亥间，始出于河南彰德府西北五里之小屯。其地在洹水之南，水三面环之。《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洹水南，殷墟上”者也。初出土后，淮县佃人得其数片，以售之福山王文敏（懿荣）。文敏命秘其事，一时所出，先后皆归之。庚子，文敏殉难，其所藏皆归丹徒刘铁云（鄂）。铁云复命佃人搜之河南，所藏至三四千片。光绪壬寅，刘氏选千余片影印传出，所谓《铁云藏龟》是也。丙午，上虞罗叔言参事始官京

某令估人太搜之，于是丙子以眉所出，多归罗氏。自丙午至辛亥，所得约二三万片。而彰德长者会牧师明义士（T. M. Menpes）所得，亦五千片。其余散在各家者尚近万片。近十年中乃不复出。其著录此文字之书，则《铁云藏龟》外，有罗氏之《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日本林泰辅之《龟甲兽骨文字》，明义士之《殷虚卜辞》（*The Oracle Records of Yin*），哈同氏之《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凡八种。而研究此文字者，则瑞安孙仲容比部，始于光緒甲辰撰《契文举例》。罗氏首统庚辰撰《殷商贞卜文字考》，嗣撰《殷虚书契考釋》、《殷虚书契考同編》等。商承祚氏之《殷虚文字类編》，复取材于罗氏改定之篇。而《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余亦有考釋。此外，孙氏之《名原》亦颇审释龟甲文字，然与其《契文举例》皆仅据《铁云藏龟》为之，故其说不无武断。而釋文字自以罗氏为第一，其考述小屯之为殷墟，又审释殷帝王名号，皆由罗氏发之。余复据此种材料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证《世本》、《史记》之为实录；作《殷周制度论》以比较二代之文化。然此学中所可研究发明之处尚多，不能不有待于后此之努力也。

（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

汉人木简，宋徽宗时已于陕右发见之，靖康之祸，为金人索之而去。当光绪中叶，英印度政府所派遣之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M. W. Steno），访古于我和阗（Khotan），于尼雅河下流废址，得魏、晋、唐人所书木简数十枚。嗣于光緒五年，先后于罗布淖尔东北故城，得魏人所书木简百余枚，于敦煌汉长城故址，得两汉人所书木简数百枚。此皆经法國人沙畹教授（Ed. Chavannes）考釋。其第一次所得，印成《和阗古迹》（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中。第二次所得，别成《罗布淖尔》（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中。此项木简中有古书、曆日、方书，尤以地圖為重要，于史、地二學关系极大。癸丑冬日，沙畹教授将此本印成之本于罗叔青參照，罗氏与余重加考订，并斯氏在利

闻所得者，缺印行世，所谓《流沙坠简》是也。

(三) 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

汉、晋模简，斯氏均由人工发掘得之，然同时又有无尽之宝藏，于无意中出世，而为斯氏及法国之伯希和教授携去大半者，则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五代、宋初人所书之卷子本是也。千佛洞本为佛寺，今为道士所居。当光绪甲午，道观毁坏，始发见古代藏书之窟室。其中书幅皆大半，而画幅及佛教所用幡幢等，亦杂其中。余见漫阳端氏所录敦煌出土唐人供养佛像及观音像，乃光绪己亥所得。又，乌程蒋氏所录沙州唐氏二面像，乃光绪甲辰以前叶瀚裴学使（昌炽）视察甘肃时所收。然中州人皆不知。至光绪丁未，斯坦因氏与伯希和氏 (Paul Pelliot) 先后至敦煌，各得六朝人及唐人所写卷子本书数千卷及印本文、古波斯文及梵文、回鹘诸国文字无算。我国人始稍稍知之，乃取其介约力避，置甘肃省所立之敦煌图书馆。前后复经盗劫，收止私家者亦当不下数万卷。其中佛典居百分之九五。其四部书中以西汉以后唐人佚书，经部有未改字《古文尚书》孔氏《传》、未改字《尚书》荀爽、康僧《高僧传》僧肇、《论语》郑氏《注》、宋法言《切问》等；史部则有孔林《春秋后语》、唐西州沙州蒲园李惠通《廿五史略稿》等（以上许在之图）；子部则有《老子化胡经》、晋尼姑《经》、景教《经》，集部有唐人词曲及通俗诗、小说各若干种。

十四冬日，上虞少氏伯氏所带敦煌本定为《敦煌石室遗书》，即行印出。这一册，24开本，不为《石室秘笈》十五种，又五经从《高僧传》二十一种，皆已散失或因抄写之故，而见伦所藏，则此此本，即此本之正本。是第一页刻出从《高僧传》内本也。《高僧传》内本，即各本之正本，从大而上成之曰也。

(四) 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

内阁大库在旧内阁衙门之东，临东华门内通路，素为典籍厅所掌，其所藏，书籍居十之三，档案居十之七。其书籍多明文渊阁之书，其档案则有历朝政府所奉之硃谕、臣工缴进之敕谕、批折、黄本、题本、奏本、外藩属国之表章、历科殿试之大卷。宣统元年，大库屋坏，有司缮完，乃暂移于文华殿之两庑，然露积库垣内尚半。时南皮张文襄（之洞）管学部事，乃奏请以阁中所藏四朝书籍，设京师图书馆，其档案则置诸国子监之南学，试卷等置诸学部大堂之后楼。此一于以后，学部及南学之藏复移于午门楼上之历史博物馆。越十年，馆中复以档案四之三售诸故纸商，其数凡九千麻袋，将以遣还俄纸。为罗叔言所闻，三倍其价购之商人，移贮于彰义门之善果寺。而历史博物馆之剩余，亦为北京大学取去，渐行整理，其目在大学日刊中。罗氏所得，以分量太多，仅整理其十分之一，取其要者，汇刊为《史料丛刊》十册，其余，今归德化李氏。

(五) 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

中国境内古今所居外族甚多。古代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西夏诸国，均立国于中国北陲，其遗物颇有存者，然世罕知之。惟北齐耶律铸，见突厥阙特勤碑及辽太祖碑。当光绪己丑，俄人拉特纳大访古于蒙古，于元和林故城北，访得突厥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回鹘九姓可汗三碑。突厥二碑皆有中国、突厥两种文字，回鹘碑并有粟特文字。及光绪之季，英、法、德、俄四国探险队入新疆，所见之文字与本尤夥。其中除梵文、佉卢文、回鹘文外，更有三种不识之文字，旋发见其一种为粟特语，而他二种，则西人假名之曰“第一言语”、“第二言语”，后亦渐知为吐火罗语及东伊朗语。此正与玄奘《西域记》所记三种语言相合：粟特语即玄奘之所谓“窣堵波语”，“睹货逻”，其东伊朗语，则其所谓葱岭以东吐火罗即玄奘之“睹货逻”。

诸国语也。当时粟特、吐火罗人多出入于我新疆，故今日犹有其遗物。惜我国人尚未有研究此种古代语者，而欲研究之，势不可不求之英法德诸国。惟宣统庚戌，俄人柯智禄夫大佐于甘州古塔，得西夏文字书。而元时所刻河西文《大藏经》，后亦出于京师。上虞罗福长始通西夏文之读。今苏俄使馆参赞伊凤阁博士（Ivanoff），更为西夏音之研究，其结果尚未发表也。

此外，近三十年中，中国古金石、古器物之发见，殆无岁无之。其于学术上之关系，亦未必让于上五项，然以零星分散故，不能一一缕举。惟此五者分量最多，又为近三十年中特有之发见，故比而述之。然此等发见物，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阐发尚未及其半，况后此之发见亦正自无穷，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

⑤顾颉刚(1893-1980)

12

答刘胡两先生书

掞藜
先生：
董人

由努力社转到两位先生的质问，披读一过，真使我高兴得很。我本来的意思，是要先把与古史有关的书一部一部的读了，把内中涉及古史的地方抄出，归纳成为一篇“某书中的古史”；等到用得着的书都读完了，它们说的古史都抽出了，再依了它们的先后关系，分别其真伪异同，看出传说中对于古史的变迁，汇成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不幸豫计中的许多篇“某书中的古史”还没有做，而总括大意的《与玄同先生书》先已登出，以至证据不充，无以满两位先生之意，甚以为愧。

但我觉得我这一文的疏漏是有的，至于这个意思总不能轻易认为错误，所以我想把胸中所有的意见详细写出，算做答文，与两位先生讨论下列诸项问题：

- (1) 禹是否有天神性？(2) 禹与夏有没有关系？
- (3) 禹的来历在何处？(4) 《禹贡》是什么时候做的？
- (5) 后稷的实在如何？(6) 兮、舜、禹的关系如何？

(7)《尧典》、《皋陶谟》是什么时候做的？(8)现在公认的古史系统是如何组织而成的？

以上的题目当在一月内做毕，登入《读书杂志》。

本期《读书杂志》限于篇幅，不能登载我的答文；我现在仅把我对于古史的态度说了。研究古史自应分析出信史和非信史两部分。信史的建设，适之先生上月来书曾说一个大旨，钞录于下：

我对于古史的大旨是：

1. 商民族的时期，以河南为中心。此民族的来源不可考。但《商颂》所记玄鸟的神话当是商民族的传说。关于此一时期，我们应该向“甲骨文字的系统的研究”里去寻史料。

2. 周民族的时期，约分三时期：

(a) 始兴期，以甘肃及陕西西境为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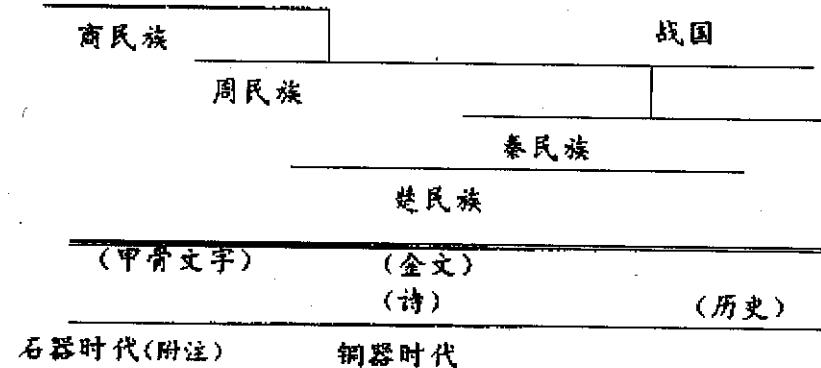
(b) 东侵期，以陕西为中心，灭了河南的商民族的文化而代之。周公之东征，召公之南下，当在稍后。

(c) 衰落期，以东都为中心，仅存虚名的共主而已，略如中古时代之“神圣罗马帝国”。

3. 秦民族的时期，也起于西方，循周民族的故迹而渐渐东进，至遂去犬戎而占有陕西时始成大国。

以时间言之，可得下表（编者按：表见下页）：

至于以山西为中心之夏民族，我们此时所有的史料实在不够用，只好置之于“神话”与“传说”之间，以俟将来史料的发现。



(附注) 发见渑池石器时代的安特森 (J. G. Anderson) 近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 (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

适之先生这段话，可以做我们建设信史的骨干。

在推翻非信史方面，我以为应具下列诸项标准：

(一) 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在现在公认的古史上，一统的世系已经笼罩了百代帝王、四方种族，民族一元论可谓建设得十分巩固了。但我们一读古书，商出于玄鸟，周出于姜嫄，任、宿、须句出于太皞，郯出于少皞，陈出于颛顼，六、蓼出于皋陶、庭坚，楚、夔出于祝融、鬻熊（恐是一人），他们原是各有各的始祖，何尝要求统一！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五帝德》、《世本》诸书就因此出来。中国民族的出于一元，俟将来的地质学及人类学上有确实的发见后，我们自可承认它；但现在所有的牵合混缠的传说我们决不能胡乱承认。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

(二) 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我们读了《史记》上黄帝的“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以为中国的疆域的四至已在此时规定了；又读了《禹贡》、《尧典》等篇，地域一统的观念更确定了。不知道《禹贡》的九州，《尧典》的四罪，《史记》的黄帝四至乃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宅以交趾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中国的统一始于秦，中国人民的希望统一始于战国；若战国以前则只有种族观念，并无一统观念。看龟甲文中的地名都是小地名而无邦国种族的名目，可见商朝天下自限于“邦畿千里”之内。周有天下，用了封建制以镇压四国——四方之国，——已比商朝进了一步，然而始终未曾没收了蛮貊的土地人民以为统一寰宇之计。我们看，楚国的若敖、蚡冒还是西周末东迁初的人，楚国地方还在今河南、湖北，但他们竟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郑国是西周末年封的，地在今河南新郑，但竟是“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那时土地的荒芜如此，那里是一统时的样子！自从楚国疆域日大，始立县制；晋国继起立县，又有郡；到战国时郡县制度普及；到秦并六国而始一统。若说黄帝以来就是如此，这步骤就乱了。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算做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

(三) 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人与神混的，如后土原是地神，却也是共工氏之子；实沈原是星名，却也是高辛氏之子。人与兽混的，如夔本是九鼎上的罔两，又是倗乐正的官；饕餮本是鼎上图案画中的兽，又是缙云氏的不才子。兽与神

混的，如秦文公梦见了一条黄蛇，就作祠祭白帝；鲧化为黄熊而为夏郊。此类之事，举不胜举。他们所说的史固决不是信史，但他们有如是的想像，有如是的祭祀，却不能不说为有信史的可能。自春秋末期以后，诸子奋兴，人性发达，于是把神话中的古神古人都“人化”了。人化固是好事，但在历史上又多了一层的作伪，而反淆乱前人的想像祭祀之实，这是不容掩饰的。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像和祭祀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是真的，政治是后出的附会，是假的。

(四) 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古代的神话中人物“人化”之极，于是古代成了黄金世界。其实古代很快乐的观念为春秋以前的人所没有；所谓“王”，只有贵的意思，并无好的意思。自从战国时一班政治家出来，要依托了古王去压服今王，极力把“王功”与“圣道”合在一起，于是大家看古王的道德功业真是高到极顶，好到极处。于是异于征诛的禅让之说出来了，“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人也出来了，《尧典》、《皋陶谟》等极盛的人治和德化也出来了。从后世看唐、虞，真是何等的美善快乐！但我们反看古书，不必说《风》、《雅》中怨苦流离的诗尽多，即官撰的《盘庚》、《大诰》之类，所谓商、周的贤王亦不过依天托祖的压迫着人民就他们的轨范；要行一件事情，说不出理由，只会说我们的占卜上是如此说的，你们若不照做，先王就要“大罚殛汝”了，我就要“致天之罚于尔躬”了！试问上天和先王能有什么表示？况且你既可以自居为天之元子，他亦可以自说新受天命，改天之元子；所谓“受命”“革命”，比了现在的伪造民意还

要胡闹。又那时的田亩都是贵族的私产，人民只是奴隶，终年服劳不必说，加以不歇的征战，死亡的恐怖永远笼罩着。试问古代的快乐究在那里？我们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样的，庶可不受他们的欺骗。

以上四条为从杂乱的古史中分出信史与非信史的基本观念，我自以为甚不误。惜本期篇幅甚短，不能畅说。

颉刚敬上 十二，六，二十。

原载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读书杂志》第十一期。

⑥ 傅斯年(1896-1950)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3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欧洲近代的语言学在梵文的发现影响了两种古典语学以后才降生，正当 18、19 世纪之交。经几个大家的手，印度日耳曼系的语言学已经成了近代学问最光荣的成就之一个，别个如赛米的系，芬匈系，也都有相当的成就，即在印度支那语系也有有意味的揣测。19 世纪下半的人们又注意到些个和欧洲语言全不相同的语言，如黑人的话等等，“审音之功”更大进步，成就了甚细密的实验语音学，而一语里面方言研究之发达，更使学者知道语言流变的因缘，所以以前比较言语学尚不过是和动物植物分类学或比较解剖学在一列的，最近一世语言学所达到的地步，已经是生物发生学、环境学、生理学了。无论综比的系族语学，如印度日耳曼族语学等，或各种的专语学，如日耳曼语学、芬兰语学、伊斯兰语学等，在现在都成大国。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语言学总是一个大题目，而直到现在的语言学的成就也很能副这一个大题目。在历史学和语言学发达甚后的欧洲是如此，难道在这些学问发达甚早的中国，必须看着他荒废，我们不能制造别人的原

4 傅斯年全集·第三卷

料，便是自己的原料也让别人制造吗？

论到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的发达是很引人寻思的。西历纪元前两世纪的司马迁，能那样子传信存疑以别史料，能作八书，能排比列国的纪年，能有若干观念比十九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北宋的欧阳修一面修《五代史》，纯粹不是客观的史学，一面却作《集古录》，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工夫。北南宋的人虽然有欧阳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纲目》，是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想的，但如司马光作《通鉴》，“编阅旧史，旁采小说”，他和刘攽、刘恕、范祖禹诸人都能利用无限的史料，考定旧记，凡《通鉴》和所谓正史不同的地方每多是详细考定的结果，可惜《长篇》不存在，我们不得详细看他们的方法，然尚有《通鉴考异》说明史料的异同。宋朝晚年一切史料的利用，及考定辨疑的精审，有些很使人更惊异的。照这样进化到明朝，应可以有当代欧洲的局面了，不幸胡元之乱，明朝人之浮夸，不特不进步，或者退步了。明清之交，浙东的史学派又发了一个好端涯，但康熙以后渐渐的熄灭，无论官书和私著，都未见得开新趋向，这乃由于外族政府最忌真史学发达之故。语言学中，中国虽然没有普日尼，但中国语本不使中国出普日尼，而中国文字也出了《说文解字》，这书虽然现在看来只是一部没有时代观念，不自知说何文解何字的系统哲学，但当年总是金声天振的书，何况还有认识方言的精深使者？古代的故事且少论，论近代：顾炎武搜求直接的史料订史文，以因时因地的音变观念为语学，阎若璩以实在地理订古记载，以一切比核辨证伪孔，不注经而提出经的题目，并解决了他，不著史而成就了可以永远为法式的辨史料法。亭林、百诗这样对付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最近代的；这样立点便是不朽的遗训。不幸三百年前虽然已经成就了这样近代的一个遗训，一百多年前更有了循这遗训的形迹而出的好成就，而到了现在，除零零星星几个例外以外，不特不因和西洋人接触，能够借用新工具，扩张新材料，反要坐看修元史修清史的做那样官样形式文

章，又坐着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杨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

推绎说去，为甚么在中国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开了一个好的端绪以后，不能随时发展，到了现在这样落后呢？这原故本来显然，我们可以把一句很平实的话作一个很概括的标准。（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上项正是所谓科学的研究，下项正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在自然科学是这样，在语言学和历史学亦何尝不然？举例说，以《说文》为本体，为究竟，去作研究的文字学，是书院学究的作为，仅以《说文》为材料之一种，能充量的辨别着去用一切材料，如金文、甲骨文等，因而成就的文字学，乃是科学的研究。照着司马子长的旧公式，去写纪表书传，是化石的史学，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书，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无论巨者或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科学研究中的题目是事实之汇集，因事实之研究而更产生别个题目。所以有些从前世传来的题目经过若干时期，不是被解决了，乃是被解散了，因为新的事实证明了旧来问题不成问题，这样的问题不管他困了多少年的学者，一经为后来发见的事实所不许之后，自然失了他的成为问题之地位。破坏了遗传的问题，解决了事实逼出来的问题，这学问自然进步。譬如两部《皇清经解》，其中的问题是很多的，如果我们这些以外不再成题目，这些以内不肯捐弃任何题目，自然这学问是静止的，是不进步的。一种学问中的题目能够新陈代谢，则所得结果可以层层堆积上去，即使年代久远，堆积众多，究竟

6 傅斯年全集·第三卷

不觉得累赘，还可以到处出来新路，例如很发达的天文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如果永远盘桓于传留的问题，旧题不下世，新题不出生，则结果直是旋风舞而已，例如中国的所谓经学中甚多题目，如西洋的哲学。所以中国各地零零碎碎致力于历史或语言学范围内事的人也本不少，还有些所调整理国故的工作，不过每每因为所持住的一些题目不在关键中，换言之，无后世的题目，或者是自缚的题目，遂至于这些学问不见奔驰的发展，只表昏黄的残缺。（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洋人研究中国或牵连中国的事物。本来没有很多的成绩，因为他们读中国书不能亲切，认中国事实不能严辨，所以关于一切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等，在他们永远一筹莫展，但他们却有些地方比我们范围来得宽些。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丁谦君的《诸史外国传考证》远不如沙万君之译外国传，玉连之解《大唐西域记》，高几耶之注《马哥博罗游记》，米勒之发读回纥文书，这都不是中国人现在已经办到的。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说句笑话，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治这学者岂不是虏学家吗？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有些地方正借重虏学呢！又如最有趣的一些材料，如神祇崇拜，歌谣，民俗，各地各时雕刻文式之差别，中国人把他们忽略了千百年，还是欧洲人开头为有规模的注意。零星注意中国向来有的。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中国文字学之进步，正因为《说文》之研究消灭了汗简，阮、吴诸人金文之研究识破了《说文》，近年孙诒让、王国维等之殷文研究更能继续金文之研究。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利用了档案，然后可以订史，利用了别国的记载，然后可以考四裔史事。在中国史学的盛时，材料用得还是广的，地方上求材料，

刻文上抄材料，档案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到了现在，不特不能去扩张材料，去学曹操设“发冢校尉”，求出一部古史于地下遗物，就是“自然”送给我们的出土的物事，以及敦煌石藏，内阁档案，还由他毁坏了好多，剩下的流传海外，京师图书馆所存摩尼经典等等良藉，还复任其搁置，一面则谈整理国故者人多如鲫，这样焉能进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中国历来的音韵学者审不了音，所以把一部《切韵》始终弄不甚明白，一切古音研究仅仅以统计的方法分类，因为几个字的牵连，使得分类上各家不同，即令这些分类有的对了，也不过能举其数，不能举其实，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钱大昕论轻唇、舌上古来无之，乃自重唇舌头出，此言全是，然何以重唇分出一类为轻唇，舌头分出一类为舌上，竟不是全部的变迁，这层道理非现在审音的人不能明白，钱君固说不出。若把一个熟习语音学的人和这样一个无工具的研究者比长短，是没法子竞争的。又如解释隋唐音，西洋人之知道梵音的，自然按照译名容易下手，在中国人本没有这个工具，又没有法子。又如西藏，缅甸，暹罗等语，实在和汉语出于一语族，将来以比较言语学的方法来建设中国古代语言学，取资于这些语言中的印证处至多，没有这些工具不能成这些学问。又如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顾亭林研究历史事迹时自己观察地形，这意思虽然至好，但如果他能有我们现在可以向西洋人借来的一切自然科学的工具，成绩岂不更卓越呢？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譬如春秋经是不是终获麟，左氏经后一段是不是刘歆所造补，我们正可以算算哀公十四年之日食是不是对的，如不对，自然是伪作，如对了，自然是和获麟前春秋文同出史所记。又譬如我们要掘地去，没有科学资助

8 傅斯年全集·第三卷

的人一铲子下去，损坏了无数古事物，且正不知掘准了没有，如果先有几种必要科学的训练，可以一层一层的自然发现，不特得宝，并且得知当年人土之踪迹，这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智识。所以古史学在现在之需用测量本领及地质气象常识，并不少于航海家。中国史学者先没有这些工具，那能使得史学进步？无非靠天帮忙，这里那里现些出土物，又靠西洋人的腿，然而却又不一定是他们的脑袋，找到些新材料而已。整理自己的物事的工具尚不够，更说不上整理别人的物事，如希拉艺术如何影响中国佛教艺术，中央亚细亚的文化成分如何影响到中国的物事，中国文化成分如何由安西西去，等等，西洋的东方学者之拿手好戏，日本近年也有竟敢去干的，中国人目前只好拱手谢之而已。

由上列的三项看来，除几个例外算，近几世中中国语言学和历史学实不大进步，其所以如此，自是必然的事实。在中国的语言学和历史学当年之有光荣的历史，正因为能开拓的用材料，后来之衰歇，正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扩充了，工具不添新的了。不过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着他毁坏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

我们宗旨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这不是因为我们震摄于大权威，也不是因为我们发什么“怀古之幽情”，正因为我们觉得亭林、百诗在很早的时代已经使用最近代的手段，他们的历史学和语言学都是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物的。他们搜寻金石刻文以考证史事，亲看地势以察古地名。亭林于语言按照时和地变迁的这一个观念看得颇清楚，百诗于文籍考订上成那末一个伟大的模范著作，都是能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的处理实在问题，因解决之问题更生新问题，因问题之解决更要求多项的材料。这种精神在语言学和历史学里是必要的，也是充足的。本这

陳垣與《1890-1969》

金明齋叢稿二編

陳垣燉煌劫餘錄序

一六六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燉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自發見以來，二十餘年間，東起日本，西迄法英，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範圍，先後咸有所貢獻。吾國學者，其撰述得列於世界燉煌學著作之林者，僅三數人而已。大燉煌在吾國境內，所出經典，又以中文為多，吾國燉煌學著作，較之他國轉獨少者，固因國人治學，罕具通識，然亦未始非以燉煌所出經典，涵括至廣，散佚半衆，迄無詳備之目錄，不易檢校其內容，學者縱欲有所致力，而憑藉未由也。新會陳援庵先生垣，往歲嘗取燉煌所出摩尼教經，以考證宗教史。其書精博，世皆讀而知之矣。今復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請，就北平圖書館所藏燉煌寫本八千餘軸，分別部居，稽覈同異，編為目錄，號曰燉煌劫餘錄。誠治燉煌學者，

不可缺之工具也。書既成，命寅恪序之。或曰，燉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其發見之佳品，不流入於異國，即秘藏於私家。茲國有之八千餘軸，蓋當時唾棄之贋餘，精華已去，精粕空存，則此殘篇故紙，未必實有繫於學術之輕重者在。今日之編斯錄也，不過聊以寄其憤慨之思耳！是說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請舉數例以明之。摩尼教經之外，如八婆羅夷經所載吐蕃乞里提足贊普之詔書，姓氏錄所載貞觀時諸郡著姓等，有關於唐代史事者也。佛說禪門經，馬鳴菩薩圓明論等，有關於佛教教義者也。佛本行集經演義，維摩詰經菩薩品演義，八相成道變，地獄變等，有關於小說文學史者也。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首羅比丘見月光童子經等，有關於佛教故事者也。維摩詰經頌，唐睿宗玄宗讚文等，有關於唐代詩歌之佚文者也。其他如佛說諸經雜緣喻因由記中彌勒之對音，可與中亞發見之古文互證。六朝舊譯之原名，藉此推知。破昏急法所引龍樹論，不見於日本石山寺寫本龍樹丘明論中，當是僥譯別本之佚文。唐蕃翻經大德法成辛酉年（當是唐武宗會昌元年）出麥與人抄錄經典，及周廣順八年道宗往西天取經，諸紙背題記等，皆有關於學術之考證者也。但此僅就寅恪所曾讀者而言，其為數尚不及全部寫本百分之一，而世所未見之奇書佚籍已若是之衆，儻綜合並世所存燉煌寫本，取質量二者相與互較，而平均通計之，則吾國有之八千餘軸，比於異國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讓焉。今後斯錄既出，國人獲茲憑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問題，勉作燉煌學之預流。庶幾內可以不負

此歷劫僅存之國寶，外有以襄進世界之學術於將來，斯則寅恪受命綴詞所不勝大願者也。

（原載一九三〇年六月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壹本第貳分）

錢穆（1895-1990）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詭。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備具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國家自身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展。

引論

中國爲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舉其特點有三。一者「悠久」。從黃帝傳說以來約得四千六百餘年。從古竹書紀年載夏以來，約得三千七百餘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十六八年。二者「無間斷」。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春秋編年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六三三。魯哀公卒，左傳終，中間六十五年。史文稍殘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資治通鑑託始，至民國紀元凡二三一四年。自魯隱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一七五二。三者「詳密」。此指史書體裁言。要別有三：一曰編年，此本春秋。二曰紀傳，本史記。此稱正史。三曰紀事本末。書本尚其他不勝備舉。四庫書目史部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所含民族分子最複雜，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於並世固當首屈一指。

然中國最近，乃爲其國民最缺乏國史智識之國家。何言之？「歷史智識」與「歷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爲歷史。其經記載流傳以迄於今者，只可謂是歷史的材料，而非吾儕今日所需歷史的智識。材料累積而愈多，智識則與時以俱新。歷史智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歷史智識，貴能鑒古而知今。至於歷史材料，則爲前人所記錄，前人不知後事，故其所記，未必一一有當於後人之所欲知。然後人欲求歷史智識，必從前人所傳史料中覓取。若蔑棄前人史料而空談史識，則所謂「史」者非史，而所謂「識」者無識，生乎今而臆古，無當於「鑒於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當知舊。不識病象，何施刀藥？僅爲一種憑空抽象之理想，蠻幹強爲，求其實現，鹵莽滅裂，於現狀有破壞無改進。凡對於已往歷史抱一種革命的蔑視者，此皆一切真正進步之勁敵也。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在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故所貴於歷史智識者，又不僅於鑒古而知今，乃將爲未來精神盡其一部分孕育與嚮導之責也。

且人類常情，必先「認識」乃生「情感」。人最親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婦乃至朋友。凡其所愛，必其所知。人惟爲其所愛而奮鬥犧牲。人亦惟愛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認識與了知。

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當面覩體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爲上帝者，而後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人之於國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愛國家民族則由乎知識，此其異耳。人之父母，不必爲世界最崇高之人物；人之所愛，不必爲世界最美之典型，而無害其爲父母，爲所愛者。惟知之深，故愛之切。若一民族對其已往歷史無所了知，此必爲無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對其民族，必無甚深之愛，必不能爲其民族真奮鬥而犧牲，此民族終將無爭存於並世之力量。今國人方蔑棄其本國已往之歷史，以爲無足重視；既已對其民族已往文化，懵無所知，而猶空呼愛國。此其爲愛，僅當於一種商業之愛，如農人之愛其牛。彼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賴於是，彼豈復於其國家有逾此以往之深愛乎！凡今之斷脰決胸而不顧，以效死於前敵者，彼則尙於其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有其一段眞誠之深愛；彼固以爲我神州華裔之生存食息於天壤之間，實自有其不可侮者在也。

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真實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歷史知識，其要在此。

二

略論中國近世史學，可分三派述之。一曰傳統派，亦可謂「記誦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謂「傳派」。三曰科學派。亦可謂「考訂派」。考「傳統派」主於記誦，熟諳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亦間爲校勘輯補。此派乃承前清中葉以來西洋勢力未入中國時之舊規模者也。其次曰「革新派」，則起於清之季世，爲有志功業、急於革新之士所提倡。最後曰「科學派」，乃承「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潮流而起。此派與傳統派，同偏於歷史材料方面，路徑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時或過之。二派之治史，同於缺乏系統，無意義，乃純爲一種書本文字之學，與當身現實無預。無寧以「記誦」一派，猶因熟諳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博洽史實，稍近人事；縱若無補於世，亦將有益於己。至「考訂派」則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爲局部窄狹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爲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於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夸創獲，號客觀，既無意於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爲有意義，能具系統，能努力使史學與當身現實相結合，能求把握

全史，能時時注意及於自己民族國家已往文化成績之評價。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論意見，多能不脛而走，風靡全國。今國人對於國史稍有觀感，皆出數十年中此派史學之賜。雖然，「革新派」之於史也，急於求智識，而怠於問材料。其甚者，對於一、三千年來積存之歷史材料，亦以革新現實之態度對付之，幾若謂此汗牛充棟者，曾無一顧盼之價值矣。因此其於史，既不能如「記誦派」所知之廣，亦不能如「考訂派」所獲之精。彼於史實，往往一無所知。彼之所謂系統，不啻爲空中之樓閣。彼治史之意義，轉成無意義。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測之全史。彼對於國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評價，特激發於其一時之熱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據。其結合歷史於現實也，特借歷史口號爲其宣傳改革現實之工具。彼非能眞切沉浸於已往之歷史智識中，而透露出改革現實之方案。彼等乃急於事功而僞造智識者，智識既不眞，事功亦有限。今我國人乃惟乞靈於此派史學之口吻，以獲得對於國史之認識，故今日國人對於國史，乃最爲無識也。

三

所謂「革新派」之史學，亦隨時遞變。約言之，亦可分爲三期。其先當前清末葉。當時，有

志功業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彼輩謂：「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譜。」彼輩於一切史實，皆以「專制黑暗」一語抹殺。彼輩對當前病證，一切歸罪於二千年來之專制。然自專制政體一旦推翻，則此等議論，亦功成身退，爲明日之黃花矣。繼「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輩之目光，漸從「政治」轉移而及「學術思想」，於是其對國史之論鋒，亦轉集於「學術思想」之一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停滯無進步，而一切事態，因亦相隨停滯不進。」彼輩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爲孔學所掩蓋。」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爲老學所麻醉。」故或則以當前病態歸罪孔子，或則歸罪於老子。或謂：「二千年來思想界，莫不與專制政體相協應。」或則謂：「此二千年來之思想，相當於歐洲史之所謂『中古時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現代之所需。」或則謂：「思想限制於文字，欲一掃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積瘤，莫如並廢文字，創爲羅馬拼音，庶乎有瘳。」然待此等宣傳成功，則此等見識，亦將爲良弓之藏。繼「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經濟革命」。彼輩謂：「無論『政治』與『學術』，其後面常爲『社會形態』所規定。故欲切實革新政治機構、學術內容，其先應從事於『社會經濟形態』之改造。」彼輩對於當前事態之意見，影響及於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一『封

建時期」也。二千年來之政治，二千年來之學術，莫不與此二千年來之社會經濟形態，所謂『封建時期』者相協應。」正惟經濟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輩議論，猶足以動國人之視聽。有治史者旁睨而嘵曰：「國史浩如煙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爲博洽諦當之記誦而已，爲精細綿密之考訂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論爲！」雖然，國人之所求於國史略有知，乃非此枝節煩瑣之考訂，亦非此繁重龐雜之記誦，特欲於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文化有大體之瞭解，以相應於其當身現實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之歷史也。」則彼固已爲共和政體下之自由民矣，無怪其掉頭而不肯顧。或告之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時期思想所支配下之歷史也。」則彼固已呼吸於二十世紀新空氣之仙園，於孔、老之爲人與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覩，闡習而無知，何願更爲陳死人辨此宿案，亦無怪其奮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封建社會之歷史耳，雖至今猶然，一切病痛盡在是矣。」於是又有志於當身現實之革新，而求知國史已往之大體者，莫不動色稱道，雖牽鼻而從，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論者有躊躇滿志之一日，則我國史仍將束高閣、覆醬瓿，而我國人仍將爲無國史智識之民族也。